

# 多维视域

——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

荆志淳 唐际根 高嶋谦一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 多维视域

——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

荆志淳 唐际根 高嶋谦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2005年3月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文明论坛”(Workshop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UBC, March 2005)会议部分论文的文集。所收录文章以早期中国文明为对象,探讨了中国商王朝及商王朝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特征以及运行机制,为当代社会观察远古文明提供了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史学的多维视角。

本书适合考古学、博物馆学、古文字学以及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荆志淳,唐际根,高嶋谦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3-023120-8

I. 多… II. ①荆…②唐…③高…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商代 IV. K22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2732号

---

责任编辑:闫向东 曹明明 / 责任校对:张小霞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唐际根 孔维星 王浩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1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8 3/4

印数:1—1 500 字数:430 000

定价:1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 多维视域中的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

## (导言)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明。长期以来，早期中国文明研究一直深受各国学者关注。近年与此相关的研究课题继续升温。回望过去，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沟通不足，隔膜尤在。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许多时候在研究过程中各说各话，更不用说艺术史家参与讨论了。以往的早期中国文明研究，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或形成的探索，关注的重点是“何时”、“何地”。对于中国文明怎么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又是什么“用力不匀”。研究者当然明白所谓“五个 W”的简单道理，但有关早期社会结构、文化特征研究或多或少被忽视。

2005年3月，我们经过认真筹划，在编者之一荆志淳执教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论坛”（Workshop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UBC, March 2005）。会议邀请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艺术史家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共30余人，为的是就中国古老文明的研究提供多维视角。学者们来自中国海峡两岸、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其中研究商代考古或历史的学者占较数量优势，这是因为商文明是公认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已知起点，研究基础最厚。我们期望与会者能够从一个共同的已知起点出发。

这是一次以中、英文双语为工作语言的会议。研讨环境为中西学者提供了更好的交流平台。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大家济济一堂，相谈热烈。本论文集正是此次会议的成果。

本文集的文章就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文章主要讨论商王朝立国以前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格局。

许倬云先生的《从新石器时代看中国古代文明核心的形成》的思路最为悠远。该文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史前基础。王宇信先生的《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通过先公先王名号的变化观察商代社会演进。他从甲骨卜辞中的相土、冥、王亥、上甲等先公先王之名谈到了灭夏前商部族的国家公权力。这是以现代国家机器的架构来观察商王朝。美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的《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思维》讨论了二里头文化至安阳商文化时期强势文化的形成过程。作者谈到了一些敏感问题，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些问题、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整合问题。这些问

题都是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傅罗文（Rowan Flad）《贞人：关于早期中国施灼占卜起源与发展的一些思考》所论述的是早期中国用卜骨或卜甲施灼向神灵占问的起源。虽然从贞人谈起，但所引考古材料的地域广度和时间纵深是以前同类文章所未见的，观察到了许多重要现象。

第二组文章只有一篇，即叶斐（Norman Yoffee）与李旻的《王权、城市与国家：比较考古学视野中的中国早期城市》。该文通过对早期城市和国家的比较研究，讨论了中国早期城市和国家的性质、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强调了王权意识形态出现、和社会关系的重建在早期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象征王权、宗教权威的青铜礼器等新型象征性的物质形式对于政治权威合法化、合理化尤为重要。

第三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商王朝，集中体现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商王朝所作的多角度观察。触及了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商王朝政治格局、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特征以及运行机制。也包括对商王朝语言文字和手工业问题的讨论。

李伯谦先生的《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该文通过商代青铜器所发现的大量被解释成族徽的铭文地理分布讨论商王朝统治范围。同类研究过去已经做过许多，李先生的研究以此为基础，作了许多精妙分析。读者自可以从文章中领略广阔的学术视野。王巍的《商王朝与方国》联系考古材料勾画了处于中心位置的商王朝与周边方国的政治地貌。文章主要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同时也运用了不少新的考古材料。孙华《商代前期的国家政体——从二里冈文化城址和宫室建筑基址的角度》一文首先回答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从西方学术的角度提出来的），即二里冈文化是否是商文化。接着就一个更为敏感和更有难度的问题，即商文化圈与商朝疆域的关系发表看法。文章最后还谈到了商王朝前期的国家政体。刘莉的《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所涉及的同样是从西方学术角度来看深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解释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郑州二里冈遗址、洹北商城、安阳殷墟，或者说这些遗址反映了怎样的政治格局。作者提出许多很具启发性的问题。这篇文章应该与孙华文章对照阅读。方辉《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一文是结合考古材料对商王朝东土经营战略的观察，这是商王朝与四方关系的缩影。因此本文属典型的案例式研究<sup>①</sup>。

客观地说，在“商研究”领域，语言文字学与考古学的对话历来并不成功。语言

<sup>①</sup> 唐际根发表了《商王朝社会组织的墓葬学观察》（原文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hina-A Mortuary perspective）一文，文章通过数理统计方法阐明商王朝的横向社会结构系以家庭和血缘亲族为基本单元，竖向结构则是高度发达的等级社会。黄明崇《论十天干与商代社会精英的血亲关系》（原文 On the ten heavenly stems and the kinship structure of the Shang elites）。这两篇文章在材料使用和观点上都颇有新意。前者由于文章过长，作者准备作为专著出版，后者也由于其他原因，这次均没有收入本集中，殊引为憾。

文字学家与考古学家正面交流虽然早已有之，但此次两个不同但相近领域的学者小范围内就商代考古学问题的探讨仍然难能可贵。

高嶋谦一《如何释读甲骨文——对现行方法之批判》属于方法论范畴。文章反对甲骨文释读工作中的随意性，主张严谨的学术操守。黄德宽《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表面上是讨论文字的，但由于文字为文明核心要素，实际探索的是早期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蔡哲茂《商代的凯旋仪式：迎俘告庙的典礼》通过甲骨材料，论实了商人迎俘告庙典礼仪式的存在，甚至发现了细节，如神主移入宗庙、庆功宴上的“饮至”之礼等。使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商文化的特征。

有关商王朝手工业问题有3篇研究文章。包括陈芳妹的《西北冈墓地艺术史研究的新线索——管窥殷商王室工艺》，闻广的《中国早期文明的标志：玉器》和吉姆·斯托门（James Stoltman）等人的《商代陶器生产——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以下简称《商代陶器生产》）<sup>①</sup>。

陈芳妹从金工艺、大理石工艺、木工艺、多材质的嵌片工艺、牙骨雕等项，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西北冈大墓中的出土品。闻广所强调的仍然是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使用玉器这一特殊材质的特殊文化现象。我们想多说几句的是吉姆·斯托门、荆志淳、唐际根和瑞璞（George Rapp）的《商代陶器生产》一文。

在研究中国文明发生和发展机制的问题上，新观点容易建立，但基于材料（数据）的观点获取却并不容易。其中一个主要难点是如何“从材料到问题”？陶器是田野考古中最易于见到的遗物。陶器有何价值？研究者易于想到的是，这些陶器可以用来“分期排队”编定相对年代，或者判别或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还可以用来研究制陶工艺。但《商代陶器生产》一文告诉我们陶器还可以用来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

所谓陶器岩相学方法，是通过观察陶器中的基质与孳和料，比较不同地点的陶器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至少可以判定一些陶器的原料“非本地生产”，有时可以判定某些遗址之间陶器的原料的相关性。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邑所在地，按《竹书纪年》记载，其作为商都的时间长达273年。如果能够证明殷墟范围内某些“居民点”（商人自己称为“邑”）的陶器并非本地烧制，而这些陶器又是被该居民点最早的定居者使用的话，岂不是暗示他们是最早的殷墟移民？结合“盘庚迁殷”的记录，《商代陶器生产》或许正好在文献与考古实物材料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该文所选来进行岩相学分析的标本中，包括出自殷墟遗址中

<sup>①</sup> 李永迪提供了《殷墟“百工”的社会与政治意义》（原文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multiple craft-production areas at Yinxu.）的论文，该文讨论了铸铜、制玉（石）、制骨等制造业，并由此出了讨论了作坊与居民点的关系。可惜本书未能如愿收录此文。

的一种所谓“红陶厚胎宽边鬲”和“红陶厚胎宽边甗”。传统的类型学研究发现，此种器物的形态、质地不同于通常所见的殷墟陶鬲或陶甗。微观岩相学观察表明，这种陶器标本所胎质和胎料的确不是安阳本地区的。很可能是“外地制造”。田野现场提供的信息是，“红陶厚胎宽边鬲”和“红陶厚胎宽边甗”往往堆积在殷墟文化第Ⅱ期以前的地层中。暗合了“早期移民”这种历史事件。当然，该文并未就此与“盘庚迁殷”或“早期移民”这样的历史事件进行联系。这是作者应该采取的审慎态度，研究者事实上已经取得了若干山东菏泽地区晚商文化遗址中的陶器标本，他们希望这些来自鲁西地区其它商文化遗址中的“宽边鬲”和“宽边甗”可与殷墟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加以比较，以进一步考察二者间关系。我们相信，类似的研究对于探讨早期中国文明的社会结构、发展机制是具有实际意义。

尽管本集收录的文章只是其中一部分<sup>①</sup>，上述三组文章，特别是第二组文章，仍然可以看成学术界对商王朝及早期中国文明所作的一次多视角观察的尝试。

本次论坛还邀请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长期从事复杂社会考古研究的资深学者，对会议讨论的论文作点评。他们包括 Michael Blake, Stephen Shennan, Hector Williams 教授。

何莫雅 (Christoph Harbsmeier)、吉德煒 (David Keightley)、Bruce Trigger 教授因故未能如期出席会议。

“中国早期古代文明论坛”的顺利召开和部分论文的结集出版，得到了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和 Chiang-ching 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的鼎力支持。科学出版社的闫向东先生、曹明明女士为本论文集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努力。

作为编者，我们衷心感谢他们！

荆志淳 唐际根 高嶋谦一

2008年9月28日

<sup>①</sup> 其他未收入本书的会议论文还有瑞璞 (George Rapp) 的《试论中原地区环境演变与早期文明的关系》、戴安娜 (Diana Larry) 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考古学和古代研究》、陈星灿的《中国早期国家的石器生产的专一化过程》、展艾伦 (Alan Thrasher) 的《商代乐器》、贝罗贝 (Alain Peyraube) 的《中国的语言和基因》、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的《考古学和古代中国的家族》、鲍则岳 (William Boltz) 的《商周文字和国家》、荆志淳的《二里冈扩张机制》、刘学顺的《商代的一日是如何开始的》。

# 目 录

(按收稿时间排序)

- 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思维 ..... 艾 兰 (1)
- 西北冈墓地艺术史研究的新线索——管窥殷商王室工艺 ..... 陈芳妹 (28)
- 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 ..... 方 辉 (70)
- 贞人：关于早期中国施灼占卜起源与发展的一些思考 ..... 傅罗文 (85)
- 从新石器时代看中国古代文明核心的形成 ..... 许倬云 (114)
- 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 ..... 黄德宽 (122)
- 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  
..... 李伯谦 (139)
- 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 ..... 刘 莉 (152)
- 商代前期的国家政体——从二里冈文化城址和宫室建筑基址的角度 ..... 孙 华 (171)
- 商代陶器生产——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 .....  
..... James Stoltman 荆志淳 唐际根 George (Rip) Rapp (198)
- 如何释读甲骨文——对现行方法之批判 ..... 高嶋谦一 (219)
- 商代的凯旋仪式——迎俘告庙的典礼 ..... 蔡哲茂 (235)
- 商王朝与方国 ..... 王 巍 (246)
- 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 ..... 王宇信 (255)
- 中国早期文明的标志：玉器 ..... 闻 广 (267)
- 王权、城市与国家：比较考古学视野中的中国早期城市 ..... 叶 斐 李 旻 (276)



# 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思维

艾 兰\*

## 一、导 言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疑古”之争中，冯友兰为了回应顾颉刚，提出了“信古，疑古，释古”，近年，此口号又被李学勤重新提起，以表明在新时代，我们应该“解释”，而非一味“怀疑”历史的记载。李学勤指出，“信古”是把传世文献当作历史的真实，而“疑古”是对这种信念的挑战，但两派都采用一种循环论证的方法，以传世文献评判传世文献。70 多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包括物质文化遗存和甲骨、青铜器和简帛上的古代文本。所以，传统文献应该依据这些新的证据，来重新得到评判与考量<sup>①</sup>。

“释古”是一个模糊的提法，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存在。而它所强调的，仍然是如何解释既有传统。然而，2000 多年来，绝大部分新证据不为学人所知，于是我们需要新的研究思维（paradigms）。我们确实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原则上讲，新的思维，要有足够的解释力，能够解读各种各样的证据，包括考古的与传统的，物质的与文字的。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中西学术界的疑古运动对既有历史传统提出的挑战；西方汉学家诸如马伯乐（Henri Maspero）<sup>②</sup>、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sup>③</sup>、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sup>④</sup> 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sup>⑤</sup> 都提出过这样的挑战。在 20 世纪，这种挑战主导了我们对文献传统进行重估时的思想方法。的确，甚至当对特定文本可靠性的早期挑战变得根据不足之时，我以为，我们也应该审慎地汲取这个巨大的经验教训：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历史的”记载从来不应作为事实简单接受。这类文本在其产生的时代，总是有着一定的撰写目的，不同于后世对待它们的目的，也迥别于我们自己的目的。因

---

\* 美国 Dartmouth College 教授。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1~19 页、341~348 页。

② Maspero, Henri. *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a Chou King*. *Journal Asiatique*, 1924, 204: 11-100.

③ Eberhard, Wolfram. *Lokalkulturen in Alten China*. Vol. 1; Supplement to *T'oung Pao*, 37. Vol. 2; Leiden; *Monumenta Serica*, 1942, monograph III, Beijing.

④ Karlgren, Bernhard. *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46, 18: 199-365.

⑤ Granet, Marcel. *Danc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59.

此，它们必须在其自身的历史与变化的意义的背景中得到解释。

夏朝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世袭王朝。然而，自 20 世纪初期晚商都城殷墟的发现，与甲骨文献记录的商王世系的确定，证实商朝的历史以来，夏朝的历史真实性已经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晚商的文字书写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它一定有着较长的演变历史，但其早期发展的证据仍十分有限，而晚商的甲骨文到现在还是中国最早的文本。成汤是传统上认定的第一位商王，甲骨文里也记载了祭祀成汤之事，即使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但也只是绵长的商王世系中的一位祖先神。我们缺少能够确认后世记载的有关夏朝历史的同时代的文字证据。

大约 20 年前，我曾主张，商人构想了一个关于夏人的神话，把它当作与自己信仰相悖的早期族群——月与之日，幽与之明，龙与之鸟，西与之东，地与之天，等等。同时我提出，这个神话被征服商朝的周人重释为一个历史上的朝代<sup>⑥</sup>。就神话研究而言，神话指的是一种思考方法，无需与任何历史事实有关。我也指出，“证明商有关夏的神话，不是证明夏只是神话。可是，如果要重建历史，不应该依靠那类神话性的材料”<sup>⑦</sup>。如果我的提法成立的话，即周人对夏朝的描述是对商神话历史化的体现，那么，它意味着传统文本中有关该神话的资料都不能确信为历史资料。这个提法并不意味着历史上不曾有过一个自称为“夏”的民族，而是说要想证明“夏”是一个历史王朝的话就必须有新的证据<sup>⑧</sup>。

多年来，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其在公元前 2 千纪早期的复杂性和成熟性，已越来越得到证明。于是，新近跨学科研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建立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目标<sup>⑨</sup>。此研究课题潜在的理论假设是，如果考古遗存与历史记载在演化程度和地理分布上彼此对应，这便足以确证二者的真实性。然而，我主张，神话是一种思考方法，无需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有联系。尽管有关夏朝创始的时间、地点和途径有着重大争议，但中国学术界近年的趋势是承认夏为历史上的王朝。

而在美国学术界则与之相反，一个极端的修正史学流派已经成长壮大，不但对夏的

---

<sup>⑥</sup> Allan, Sarah. *The Myth of the Xia Dynas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4, 2: 242-256; Allan, Sarah.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1991, Albany: SUNY: 57-73. 就我所知，尽管不少西方学者都把所谓夏视为神话，而我则是唯一对有关夏的传统历史与文献进行神话学解读的人。

<sup>⑦</sup> 同注<sup>⑥</sup>Allan. 1984: 242.

<sup>⑧</sup> 我尝试确立严格的神话学原则用来划分史料。照此，我认为属于信史的资料是，没有服务于神话或意识形态目的的超自然的元素或细节。后期夏王世系（从予到桀）基本上是一个中性的系谱，但夏朝的观念似是一个神话建构并因此不无疑问。所以，即使我们认为后期夏王朝世系是可信的，但我们对列入世系者也一无所知。注<sup>⑥</sup>Allan. 1984: 253-254.

<sup>⑨</sup>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纪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331~332 页。

历史性提出挑战，而且还挑战任何将先秦考古与传统文本联系起来的努力。有时对“中国”这个概念用于先秦时代也提出怀疑。更极端的，甚至质疑使用诸如甲骨文这样的同时代的文献资料，来评价物质文化的记载。例如，在《剑桥中国古代史》中，贝格利（Robert Bagley）没有谈及甲骨文证据，其理由是甲骨文的解释是基于一个假设——商朝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主导地位。他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作为传统解释模式的本质，即（商朝的）中心性和文化统一性，在安阳（殷墟）时期的考古材料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公元前2千纪的最后两三个世纪，文明已经广为传播，文明社会分布辽阔。很多证据表明，这些不同的文明在地理上远离安阳，文化上不同于安阳……‘王朝’一词的使用要特别慎重，因为在中国的历史著作中，它的含义已超出了统治家族在字典上的意思。‘中华文明’概念的表达，也应遭到类似的质疑，它是一个模糊含混的概念，将之置于公元前2千纪，只能是误导。”<sup>⑩</sup>

## 二、文化制导

我们寻求的不仅是对现有资料的新的诠释，而且需要新的思维。下面，我从这一角度出发，将论题从国家形成和历史描述的准确性，切换到文化制导（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上。最早形成于公元前2千纪早期，并以河南偃师、安阳为中心贵族文化或上层文化（elite culture），在商代末叶确立了在中国内地的文化制导权。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一书中，刘莉和陈星灿指出，二里头遗存恰当地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形态；以聚落分布为证，二里头遗址在一个四级聚落等级形态中，控制了比它小的中心和村庄。与早期和同期的遗迹相比，二里头遗址的范围更广<sup>⑪</sup>。这个研究完全依赖考古证据，没有将考古遗存与传统历史关联起来。尽管有关贸易路线的重建是猜测性的，但是关于二里头具有超出任何同时期文化的国家管理水平和疆域的全部假设，显然是成立的。

20世纪大量详细的甲骨文研究充分证明，商王维持了一个包含多种类型政治联系的紧密网络，其覆盖了广大的地域<sup>⑫</sup>。就此而论，他们显然是天下无敌。甲骨文列出了

<sup>⑩</sup> Bagley, Robert W. *Shang Archaeology*,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4-231. 贝格利好像是在主张，所有甲骨研究不管怎样都是不客观的，而是有偏向性。然而，由于他不曾引用任何甲骨文本或有偏见的二手文献，这代表了一种旨在批评中国考古学家工作的理论立场而非一种不同的研究观点。

<sup>⑪</sup> Liu, Li and Xingcan Che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亦见陈星灿、刘莉、李润权、Henry T. Wright、Arlene Miller Rosen: 《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区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3期。

<sup>⑫</sup>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490~522页、582~591页。

第 21 位商王武丁的妻子，至少有 64 位<sup>⑬</sup>。她们大都以“女”字旁与地名合成的一个字命名。由于族群与其首领的名称以地望命名，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些地方的首领都曾将本地女子婚配给商。甲骨文中常有人或物的供奉记录，估计这些人或物是外地供奉的用于祭祀的牺牲品。

甲骨文的内容反映商王室的立场，因此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但其作为历史档案的优势之一是，它们都是占卜的即时记录。这些占卜是为了商王室内部的需要，主要关注降临商王及其王室的灾异的神的意志。毫无疑问，占卜的原始目的是用恰当的仪式避免或回应灾异<sup>⑭</sup>。因此，不同于旨在颂赞祖先与发布政令的青铜器铭文和《尚书》文告，甲骨文提供了大量负面的信息。当然，除了商，还存在着其他地方政权。关于商政权的本质和范围的问题仍可讨论，但是历史上唯有商的文化影响才真正覆盖了中国内地。

接下来讨论的是文化影响。下面的讨论完全基于青铜器方面的研究。尽管这项复杂的研究也涉及其他方面，诸如同是作为上层文化标志的青铜仪仗兵器、特定类型的玉器、依据甲骨裂兆进行的占卜以及主体建筑的结构。到晚商时期，中国境内的所有地区都把青铜礼器及相关器物作为上层文化的权威性标志，而并没有体现出文化差异性。二里头遗址不同寻常的地方，不是因为在那里发现了青铜器——中国考古发现表明，大约在公元前 2 千纪初期，青铜已广为分布<sup>⑮</sup>。但就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容器是在二里头铸造的。青铜容器的发展是与祭祀礼仪活动紧密相关的。

二里头时期，青铜容器最初被用作酒器。在二里冈时期（早商，约公元前 1600 ~ 前 1300 年），青铜容器的使用范围扩大到象征权力的容器，和成套的食器、水器，还有酒器。这些器物都用于礼仪上。无论在哪里发现，这些容器都有特别的礼仪类型。其类型都一致。尽管在殷墟时期（晚商，约公元前 1300 ~ 前 1050 年），它们的类型有地域性的变化，但其有限纹饰图案的流行是十分显著的。这种纹饰图案形成于二里冈时期，那时器物开始有纹饰。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器物理解为一套特定礼仪实践的标志。这一礼仪与上层文化相关。到了晚商，这类器物已经广泛分布。它们见于内蒙古、广西、山东和四川这类广阔而远离殷墟的地域。确实，在中国很少有地方没有发现商代青铜器<sup>⑯</sup>。

⑬ 胡厚宣：《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1，128 ~ 129 页。

⑭ 同注⑥Allan. 1991: 117-119.

⑮ 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65 ~ 69 页，表 5.1 所列金属器皿发掘表（二里头以前）与所引的原始报告。发掘综述见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 年 7 期。Linduff, Kathryn M., Han Rubin and Sun Shuyun, *The Beginnings of Metallurgy in China*. Lampeter, Wales: Edwin Mellon. 2000.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火烧沟四坝文化同期成分分析及制作技术的研究》，《文物》2003 年 8 期。

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379 ~ 386 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 ~ 4 册），文物出版社，1996 年。

### 三、青铜容器系文化表象

青铜容器通常出自于墓葬，有时器内伴出骨、粮食甚或酒。而且，在晚商时期，青铜容器的铸造有针对性，供奉给特定的人或家族，它们通常用来祭祀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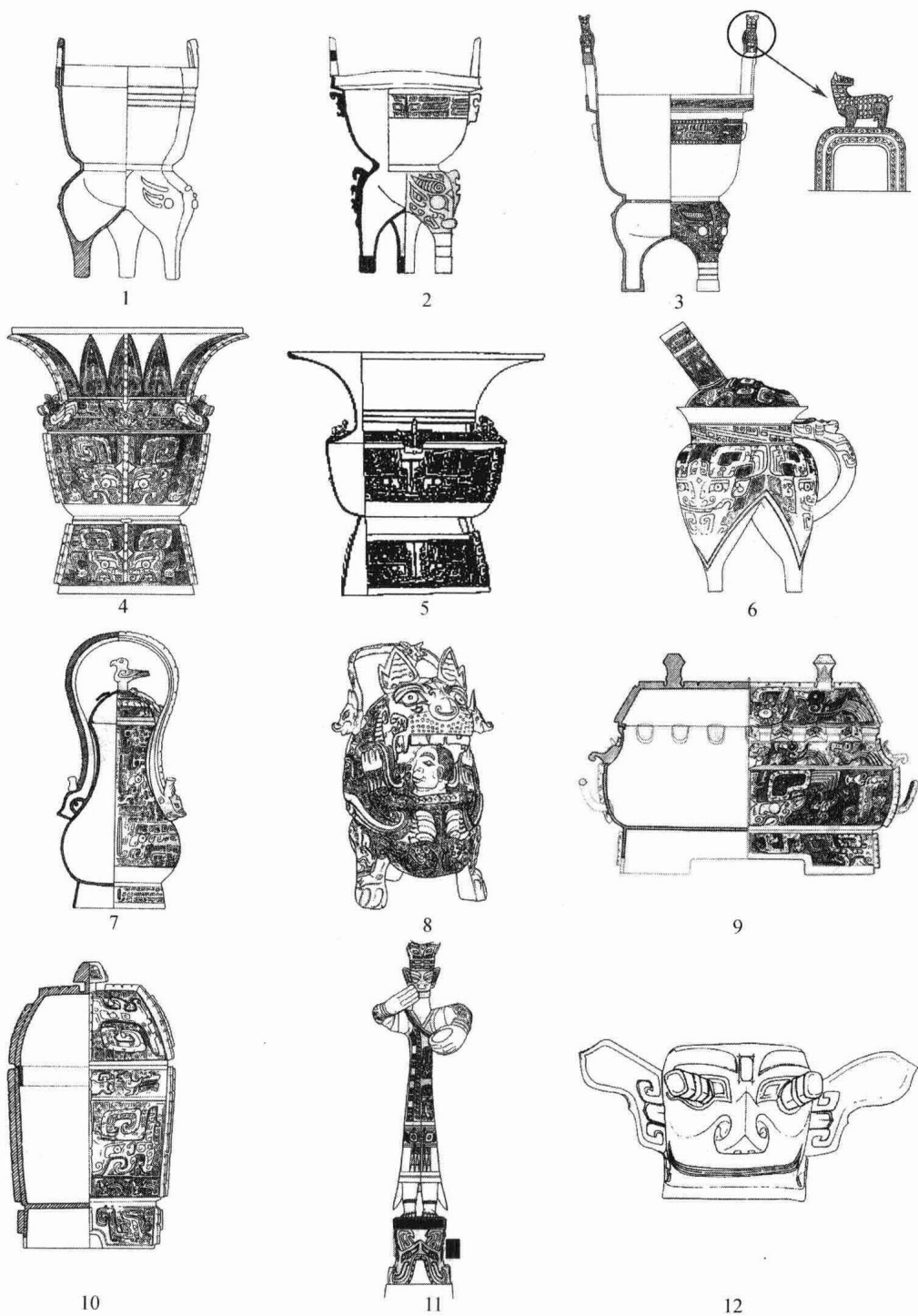
而且，甲骨占卜主要是有关确定对祖先神的祭礼是否恰当，以便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免于受到他们的诅咒。因而，甲骨文进一步提供了有关礼仪的证据。在这些礼仪中，青铜容器有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确定这些青铜容器是在当地铸造或者由外地输入；更不用说，在中原，或边远地区，这些礼仪的详情。然而，青铜器不仅是显赫之物，它们也是用于浸泡、加热、斟灌、饮酒、做饭、盛食物以及宗教洗礼中盛水的容器。这些器物有其功能和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意味着使用它；就是说，器物的拥有者要把器物 and 祭品奉献给祖先，要把它们埋于自己的墓中。如此一来，其他文化的精英们则开始仿效这种祭礼。这种礼仪与基于中原的文化有关。

下面我们把青铜容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或用斯佩伯（Dan Sperber）的术语叫“文化表象”（cultural representations）。按斯佩伯的定义（1996年），“文化表象”意指反复传播，即它们或宽或窄或久或暂地蔓延，并在较广的人口范围内普及<sup>①</sup>。所以，青铜礼器，如鼎（三足圆鼎或四足方鼎的食器）可以被看做一种文化表象。这就是从一个事实得到证明，即鼎是一种不断重复的器型。它见于商朝时期遗址的发掘中，无论出自哪里我们都容易识别。我们也能够识别其他类型的器物——爵，觚，盃，尊，甗等。从类型学上进行识别，并据此推论每一种器物类型都有特定用途，尽管赋予它的名称并不准确，以及礼仪的细节已不为我们所知。

各种器物类型的形状和纹饰，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别，但是我们也能够毫不迟疑地把几乎所有器物分门别类。这种器物的类别来自于宋代的古物学（商周主要的器物类型见图一说明）。甚至形制异常的器物，我们也容易根据类型，进行鉴定和归类。这些证据强烈地表明，这些器物是遵循一套共同的礼仪。无论出自安阳殷墟（那里发现了内有一个人头头的甗）、陕西省醴泉朱马嘴或湖北省浠水白石乡<sup>②</sup>，鼎即鼎，甗即甗。一个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四足甗，耳上饰双兽，但显然仍是甗（图一，1~3）。无论出自殷墟时代初期掌权的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还是与四川广汉三星堆有文化特色的人像一起出土（图一，4~6），尊仍是尊。甚至被认为出自湖南而今藏于巴黎塞努施奇博物

<sup>①</sup> Sperber, Dan. *Explaining Culture: a Naturalistic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1996. 斯佩伯（Sperber）把文化表象划分为观念（精神表象 mental representations）与物质表达（公共表象 public representations）。按此划分，特定容器的铸造属于公共表象，而关于容器的观念，如鼎，则是精神表象。

<sup>②</sup>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27页。



图一

1. 甗（殷墟武官村） 2. 甗（陕西醴县） 3. 四足甗（江西新干） 4. 尊（殷墟妇好墓） 5. 尊（四川三星堆） 6. 盃（殷墟妇好墓） 7. 卣（殷墟妇好墓） 8. 卣（巴黎塞奴奇博物馆） 9. 偶方彝（殷墟妇好墓） 10. 方彝（殷墟妇好墓） 11. 立人像（四川三星堆） 12. 凸目大面具（四川三星堆）

馆 (Musée Cernuschi) 的“虎食人”卣, 其显然是一个卣 (图一, 8)。出自妇好墓的“偶方彝”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别的地方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彝; 然而, 它只是把两种类型的普通器物合二为一而已 (图一, 9)。

商代青铜器的特别形制, 反映了它们在商代礼仪中的特定角色。就能确定的来说, 尽管器物形制有些变化与混杂, 所有见于中国其他地区的青铜礼器的类型, 在殷墟都有发现。但唯一例外的器物形制是兽形器。这些一般被划归为尊, 这个名称也用于指口沿外折的大的酒器, 但其在形制上常常是独特的。例如,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里的一个尊, 呈犀牛形, 动物的鼓腹为容器<sup>①</sup>。这种形制的一致性, 不管出土在什么地方, 表明异地生产青铜容器的时候, 也按照商的礼仪形式制作以便仿效商。

青铜器不仅与礼仪的形式和作用一致, 见于容器的纹饰的图案从外表看也显著地协调一致。在青铜容器最早有纹饰的二里冈时代, 出现了双眼的纹饰图案, 传统上认为是饕餮纹, 其无论在哪里都是普遍存在的, 只有很小的一点变化<sup>②</sup> (图二)。在晚商以前, 尽管有着地域风格上的不同, 但原始的纹样——饕餮、像龙的夔和像鸟的形制——无论在哪里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纹样的本质是不断变化与互相变形。而且, 一个纹样有时可有多种方法解读。例如, 双身饕餮也可看作双面龙。这种热衷于变化和变形, 而不是对真实的或意念中的事物的描绘, 使得特定纹样的界限很难划定。所以, 诸如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sup>③</sup>、张光直<sup>④</sup>设置包括变形在内的类型题目的尝试, 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sup>⑤</sup>。然而, 即使稍微熟悉商青铜器艺术的人, 在识别饕餮纹和夔龙纹方面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曾经提出, 这些图案的意义来源, 不是出自作为特定造物者或上帝的代表, 而是对作为牺牲的动物和人的概括性说明, 是传达给另一世界与墓主的。饕餮以双目为特征, 其源于动物包括人的变形的组合, 都是作为牺牲。它的嘴张开, 有时没有下颌, 经常是双身。这些相似的龙的纹样, 也会作为器物最主要的纹样。依据此说, 双目及其变形代表其能看到生者不能看到的灵间世界与神力; 张着的嘴既象征吃, 也象征着通向那个世界。我也提出, 兽身人口的不寻常的纹样, 突出地见于南方的容器 (但也见于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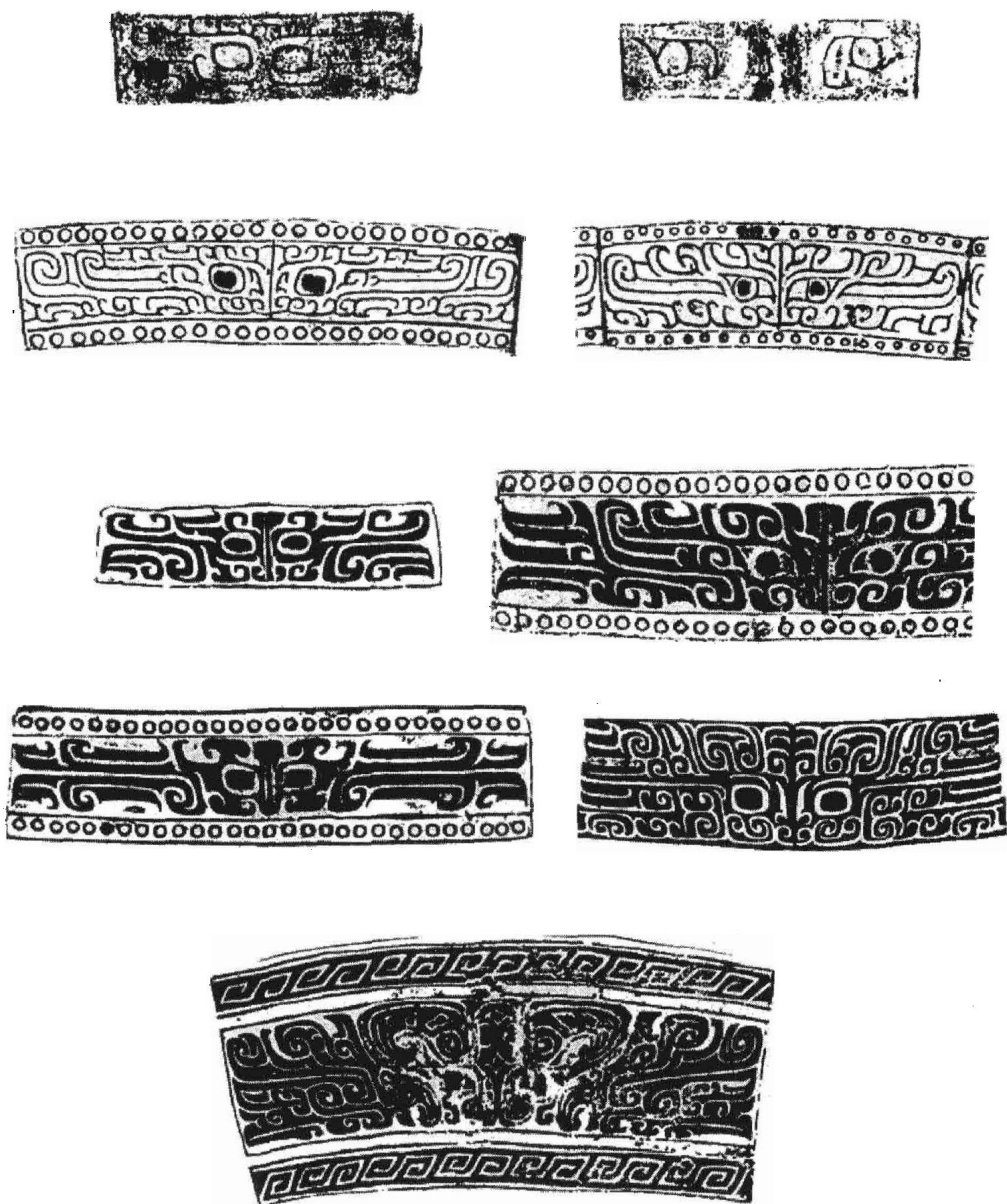
<sup>①</sup> D'Argencé, René-Yvon Lefebvre.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7: 42.

<sup>②</sup> 关于此纹样名称的讨论, 见 Wang Tao. *A Textual Investigation of the Taotie*. In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 Roderick, Whitfield e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2: 102-118.

<sup>③</sup> Karlgren, Bernhard.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6, 8: 99-156.

<sup>④</sup> 张光直: 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刊 LXII, 1972 年。

<sup>⑤</sup> 同注<sup>④</sup>, Allan. 1991: 138.



图二

墟)，是饮食与牺牲图案的较为写实的艺术表达，饕餮纹的普通形制亦复如此<sup>24</sup>。然而，即使这个主张不被接受，甚至如最不寻常的例子像塞努施奇（Cernuschi）的卣，仍与传统器物类型一致，并用别的纹饰——饕餮、夔龙等——属于标准的整套作品，所以，它们仅仅是中原器物的外地异形。值得惊讶的不是在中原以外制造的器物有些风格上的变化，而是极少有不同寻常的纹样，甚或共同纹样的不同寻常的艺术处理，出现。

<sup>24</sup> 同注⑥，Allan. 1991: 141-157.



斯佩伯（Sperber）用“流行病”作为隐喻用来理解这种文化表象的传播。他提出，人的思想面对文化表象，与人的身体面对疾病有着同样的方式。然而，他指出，疾病只有很少出现变异，而文化传播在传递过程时常出现变形。然而，像疾病一样，文化表象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颇为不同的专门解释。这则隐喻的优点在于，让我们理解文化表象并不传播任何技术便利。如青铜鼎和玉斧一样，可以见于辽阔的地理区域而无法解释其扩散的方法途径。可是，疾病隐喻的使用应该是有限度的，因为它暗示了所有文化都有同等的影响。我的假设是，在古代，如同在现代，文化表象倾向于由强势一方到弱势一方传递。而且，尽管主导文化的文化样式易于出现变异，但此变异受制于迎合被“传染”文化的已知的基本准则。

基于华生（James L. Watson）及其人类学同事的研究<sup>25</sup>，我以麦当劳在东方的角色做个类比。当东方人在麦当劳用餐的时候，不是因为偏爱这种食物胜于地方食品才这样做（连喜欢它也不一定），也不是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出于经济原因在此用餐，麦当劳在东亚是比较贵的。他们在麦当劳用餐，因为在于它是美国的和他们希望参与到现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来。美国文化形式，即使是麦当劳或者牛仔裤，也被全球所追慕，因为美国是经济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它的产品比别的地方的同类产品天然的好，或者是因为它们优于来自其他经济发达而不够强大的国家的产品的产品。北欧的自助餐（Smorgasbord），尽管好吃且方便，但它仍主要局限于北欧。

通过模仿美国文化样式，人们也许某种程度上得以分享它的财富、强大和威望。如果你带你的孩子去麦当劳，孩子或许最终会在哈佛大学学习（像一个人在被采访中所说）；或者，至少未来获得好的发展机会。于是，尽管这种餐馆根据当地条件会有些许变化（如在印度没有牛肉）。但重要的是，麦当劳餐馆看起来都有一定的样式——或多或少像在美国的那样。食物必须用特别的方法买，且用盘子装。没有如在其他餐馆那样餐桌旁提供服务的服务员。它必须用手或专门（一次性）的餐具吃，并在理论上用餐完毕应该由顾客自己清理。这种程式化的做法及其体验是要点所在，而不在于食物本身；因此，此种体验，作为美国麦当劳的复制品，是可以认知的。

正如一位考古学家在 2000 年后的北京发现了金色拱门（麦当劳标志性建筑），他则不能据此认定美国当时在中国拥有政治权威。我们也不能从安徽、广西或广东都发现商代风格的礼器这一事实，认为商的政治已扩展到如此广大的范围。然而，它的传播确实体现了伴随财富和政治力量而来的文化制导地位。青铜礼器，不像兵器或农具，不能

<sup>25</sup> Watson, James L. Ed.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Watson, James L. China's Big Mac Attack.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Food and Eating*, eds. James L. Watson and Melissa L. Caldwell. London: Blackwell. 2005. Yan, Yunxiang. Of Hamburger and Social Space: Consuming McDonald's in Beijing.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Food and Eating*, eds. James L. Watson and Melissa L. Caldwell. London: Blackwell. 2005.